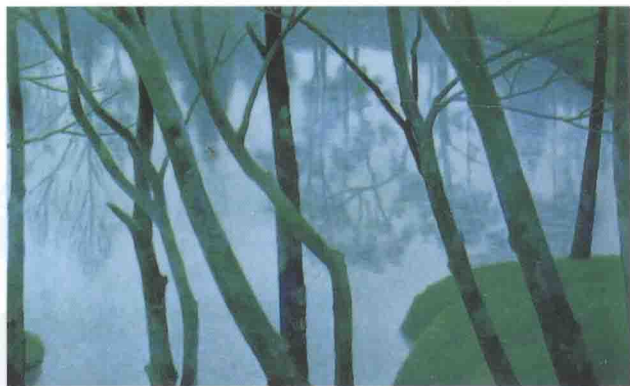


成己成物

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研究

Chengji Chengwu

曹孟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成己成物

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研究

Chengji Chengwu

曹孟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己成物: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研究/曹孟勤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6

ISBN 978-7-5426-4791-7

I. ①成… II. ①曹… III. ①生态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3386 号

成己成物——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研究

著 者 / 曹孟勤

责任编辑 / 张 华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8

书 号 / ISBN 978-7-5426-4791-7/B·368

定 价 / 4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导 论

生态伦理的实践转向

生态危机的发生和自然环境的残破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当代人纷纷出谋划策,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与生态学或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学科和行为道德规范,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环境法学、生态社会学、绿色化学、绿色生物学、环境地理学等精彩纷呈。伦理学也不例外,它在要求将道德关怀普照于自然存在物,并承认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道德关系的基础上,也生成了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出现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场革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当代思想史中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有些人相信,这一观念所包含着的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可以与 17、18 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①然而,生态伦理学在产生后的短短几十年里,尽管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保护自然环境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为绿色生活建构起了伦理模式和道德规范,但其研究立场和所遵循的研究路线却是抽象主义的,把对生态伦理的探究仅仅局限于价值观念范围内、纯粹意识活动领域,

^① [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 页。

主张用观念解构观念,用范畴批判范畴,将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本出路规定为人们对生态价值观的确认和接受方面。如生态伦理学研究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支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只有彻底清算人与自然分裂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才能够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于是,生态伦理学研究便围绕着是应当遵循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应当遵循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出,只有以人为中心,并从维护人类的利益出发,保护自然环境才具有道德合理性。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则主张,只有以自然为中心,尊重自然本身拥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才算是好的,维持大地的和谐、美丽与稳定才算是善的。

说生态伦理学的这种研究理路是抽象性的,是因为其脱离了社会现实性,即没有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进行生态伦理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出发。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①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现实出发?这是因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也就是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任何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响,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②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凡是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而大谈特谈价值观念的革命,大谈特谈人类的共同利益或自然界本身的权利,都应当属于抽象主义的立场和抽象主义的研究理路。乔纳森·休斯指出:“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马克思的道德怀疑论就可以视为这样一种警告:不能简单地把生态问题看作一套错误价值观的结果,似乎可以通过颁布一项新的无需考虑那些价值观背后的利益和结构的伦理准则来矫正生态问题。”^③

按照环境正义理论的批判,生态伦理学理论的抽象性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人类不是现实的人类,而是抽象的人类;人类的利益不是现实的人类利益,而是抽象的人类利益。因为从现实的社会生活来看,没有共同的人类,人类仅仅是一个集合概念,也不存在共同一致的人类利益。现实的人是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人,现实人的利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存在着对抗和冲突。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政府之所以未能达成有效的一致意见,就在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益冲突。如果用共同的人类这一概念代替现实的有差异的主体,就有可能掩盖现实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强势群体或发达国家破坏自然环境,却让弱势群体或发展中国家承担破坏自然环境的恶果。“环境伦理强调的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更多地表现为强势国家、地域或群体的利益。在当今社会现实之下,将人类特别是当代人视为不可分整体的做法,将会藉由‘共同的需求与命运’、‘共同的目标’的名义,掩盖或忽视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及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对抗性,使环境保护成为一句美丽的空话或一种不公正的暴行。”^①不仅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抽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抽象性的。不仅其所论证的自然权利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脱离了人的社会存在,而且其所认定的存在着一个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自然环境也是一种主观想象。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自然界是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界,是彰显着人的社会历史结果的自然界,自然界对人来说虽然具有先在性,但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类历史的自然界也是无,即离开了人、离开了现实社会,自然界就是抽象的自然界。同样道理,自然环境由于具有社会性和社会意义,因而它对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的人,其意义也不一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完全一样。众所周知,土著居民与当代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的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就有相当大的差别。

生态伦理学的这种抽象性研究理路,由于完全忽视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观念世界的基础性和制约性地位,因而其存在着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将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完全归结为现代价值观是失之偏颇的,二是对现代价值观仅仅展开理论批判和建构一种生态价值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任何撇开历史、现

① 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

实的逻辑分析,任何远离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理论建构,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科学结论。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形成统治、支配自然界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实践问题。现代性价值观的产生完全根源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合理在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合理。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刻原因应当是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生产模式是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这种普遍否认人类生态基础的重要性。许多人将此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发源于‘支配大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①因此,欲消除生态危机须先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欲要彻底解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必须彻底批判和改造作为现代价值观念生成根源的现代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要想确认一种新的合理的生态价值观,就必须建构一种新的合理的物质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代价值观念的理论批判上,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生态价值观念的理论建构本身,还必须改造现代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②

①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物质生产方式是指人类进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它既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又是人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刻根源;它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又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的现实基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也就是说,对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深刻分析应当指向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基本问题应当遵循的基本路径和方法。物质生产方式的道德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才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所在。生态伦理学研究脱离物质生产现实讨论善恶问题,难免会给生态伦理带来现实性难题。如对谁是破坏污染自然环境的罪魁祸首的追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人类。然而事实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对资本和利润的贪婪攫取,并不是穷人和一般百姓。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布克金对笼统性的把穷人与富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全都置于一种同等地位,每个人,无论他或她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都必须为地球的困境承担相同的责任,表示非常的愤慨。他说:“神秘主义生态学谈论由‘我们’、‘人民’或‘人类’等词汇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这一思潮将一个特权阶层置于一种有利地位,这一阶层非常急切地指责一个剥削社会的受害群体为当今时代的社会与生态弊病负责。这种观点所滋养的政治短视和社会迟钝比幼稚危害更大,它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惑人心,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一种彻底的反动。”^②再比如,不分穷富差别而一概要求人们尽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对发达国家和富人来说是一种福音,而对发展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② [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1991年版导言,邹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家和穷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灾难。正是生态伦理学研究完全从“应然”出发,使本来具有实践特性的生态伦理缺乏实践特质。如以人的利益为生态伦理的出发点,就缺乏可操作性。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存在强势群体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那么到底是以强势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呢?还是以弱势群体为出发点呢?这恐怕是目前生态伦理学研究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完全反对这种抽象性的研究理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所创立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种“物质实践”就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①恩格斯也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②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着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脱离物质生产现实,难免会使所讨论的问题陷入抽象空谈之中。费尔巴哈就脱离物质生产现实言谈自然的本质和人的本真性,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而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认为他谈论的人是抽象的人,谈论的自然也是抽象的自然。

当然,笔者并不想否认价值观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作用,也承认批判现代性社会的掠夺自然和支配自然之价值观的积极意义,笔者只不过是遵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透过价值观表象而深入到其背后,追问影响现代性价值观生成的现实因素,并从现实出发探究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寻求拯救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所开辟的研究问题的路径,根本不同于抽象主义的研究路径,它是从现实出发,即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得以发生和得以进行的出发点和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①正是通过这第一个历史前提,人类与动物挥手相别,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程。“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既然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人类历史运行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历史,那么同样也创造了道德观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道德观念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生成出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道德观念根源于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道德观念的本体，我们就需要从物质生产劳动入手并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确证人对自然世界的伦理信念、伦理价值和伦理规范。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路无疑正确且合乎逻辑的。人类只有先进行物质生活，然后才能达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生活或善生活。

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同时还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为了更好地说明人对自然界应当具有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笔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关系向度探究人类的生产活动，并把这一生产活动规定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生产活动出发探究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也就是从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出发探究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生态危机并不是由自然环境本身的自然而然地变迁导致的，而是由现代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生态危机是现代人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结果。诚如日本著名学者岩佐茂先生所说：“这里所要研究的自然环境破坏，并不是自然本身变迁中发生的生态系破坏，而是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球生态系破坏。”^②岩佐茂先生所说的“人的活动”就是指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引起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破坏，现代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欲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对现代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践活动进行反思,从道德上审视并检讨其不合理的方面,彻底改变现代人的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方式,使其由对自然世界的恶彻底转变为对自然世界的善。也就是说,生态危机使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问题凸显,使当今人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道德追问。如何安排自然界,如何设计自然界,如何改变自然界,才具有道德合理性?这是当今人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所谓道德合理性是指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要合乎道德上的真理性,即合乎善、合乎正当、合乎正义、合乎道德规范,对自然界树立良好的道德态度,做到有道德地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并取得善的结果。

人类要维持自己的在世生存,就必须向自然界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自然世界作为先于人类的存在,其存在的直接形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生存目的和生存需要,于是,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以自己的意志活动否定外部自然界的直接存在形态,使之合乎人的生存目的和生存需要。人类这种以自己的意志活动否定自然物存在的直接形态,就是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属于“制作”或“创制”活动,依据康德的理解则属于“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活动,遵照阿伦特的说法则是人的劳动活动。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阿伦特所谓的“实践活动”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是人类的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的活动,不包括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或生产实践则包含着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制作”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是二者的统一。笔者所使用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内涵,主要遵循马克思的劳动或生产概念,认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或者说是感性人的现实活动,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人类劳动或人类生产首先是加工改造自然界,人与

自然界从而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这一直接关系的发生就没有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然而,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并不是原子式的、单个人的活动,它总是与他人一起并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共同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因为单个的人无法同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各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形成超出个体的社会力量,才能向自然世界谋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当然,笔者提出和专门使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这一术语,主要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要探究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物这一实践活动本身的道德合理性。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制约,自然也就需要探讨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合理性对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道德合理性的影响。

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进行道德反思,长期以来被人们、也被伦理学所忽视,而且有不少人还觉得,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进行道德反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种观点认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之后而获得的一种天命,是自然必然性强加于人身上而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就像所有动物捕食一样,改造自然界属于人类特有的且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和神圣使命。因此,不需要对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进行任何道德反思,或者说进行道德反思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这就像对动物进食进行道德反思一样而无比荒谬。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把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称为“制作”或“创制”,并与具有伦理特征的“实践”活动区别开来,认为其不属于道德考察的对象。“实践所具有的理性品质不同于创制所具有的理性品质,两者并不相互包容。实践并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实践。”^①德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把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归于认识论范畴,认为在这一领域人类的实践活动属于现象界,其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自然必然性,做到人为自然立法,并完全由自然科学来完成。康德明确表示,在这种“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领域只能讨论理论理性的“认识”是否正确,根本不能讨论、也根本不存在实践理性的善恶问题,因为该领域属于实然、事实领域,不属于应然、价值领域。与此相似的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既然是人的天命,其本质在于维持人的生存,因而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天经地义的,天然具有道德合理性。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先天具有维护人类存在的道德价值,根本不需要对其进行道德反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长期以来人们几乎没有从人与自然关系向度对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展开道德反省和道德批判,现代性社会更是认为,自然存在物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它仅仅是在对人的有用性方面具有工具价值,人类对待和处置自然存在物的任何行为都是天经地义、合乎情理的。

然而,无论是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不能进行道德反思的观点,还是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天然具有道德合理性的观点,都是存在问题并需要深刻反思的。应当承认,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存在来说确实具有自然必然性,是任何时代的人类都不得不为之的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确实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对人的存在确实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但问题是,人类不得不为之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具有满足人的理想追求的价值,实现着人之为人存在的价值。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除了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外,同时还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理想内置于实践活动当中,使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之“是”承载起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之“应当”。当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与人的本质存在和价

值存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时,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必然成为人的存在的体现方式,成为人所追求的理想价值的载体。人的理想追求属于应然性,其价值是将现实自然界改造的符合人所期待的价值应当,它从道德上规范着人们的实践态度和实践行为,为人们如何改造自然界确立了内在尺度。人的内在尺度内置于实践活动之中而成为实践活动的本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了道德属性,而成为一种应当。既然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本身不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还是一种价值存在,应然性存在,其中贯彻着人的目的、意志和内在尺度,那么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进行道德追问就成为可能,并且具有必要性。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创造了人,人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本不同于完全被自然必然性所束缚的动物存在,人之为人的存在是一种道德存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将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视为一种纯粹的自然必然性的活动,根本不存在人的自由和选择,完全与道德无涉,就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这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因为任何道德都必然维持人的存在,不能维持人的存在的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但是,把维持人的生存需要看作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本身的唯一功能和唯一目的,这无疑是将人等同于动物性的存在,这本身却又不道德的。马克思对劳动活动仅仅是满足人的肉体需要的观点提出了激烈批判,他认为,如果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必然导致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人是道德存在物,道德是人之为人的象征,人的道德性作为理性的实践落实于人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必然使这种实践活动本身带有道德属性。于是,道德问题与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具有了内在关联,从道德上反思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

动就成为可能。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并不纯粹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还必然涉及价值论问题,是人的“成己成物”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当代,现代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使人类生存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从道德上反思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显得更为重要。

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进行道德反思,首先是追问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即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道德形而上学问题,它直接关乎人的存在目的、人的生活意义和终极价值追求,并最终影响人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行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虽然最初之时是人类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但是当人类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目的和存在意义时,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超越了满足生存需要的工具价值,开始显现人生的意义和人生价值。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实践目的内含着人的存在目的,并实现着和显现着人的存在目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道德追问就直接涉及人是什么?或人是谁?以及人怎样存在才是合理正当的?进而言之,人类为什么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道德追问,实际上是在追问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援引的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问题和中国孟子的“人兽之别”的问题。现代性社会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之目的的设定方面出现了偏差,将实践目的视为纯粹的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物质幸福,追求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结果导致了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与破坏。因此,欲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目的设定方面进行道德思考,修正现代性社会改造自然界之目的,合理设置改造自然界的目的。

其次是追问人类怎样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这涉及到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方式的问题,实现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之目的的手